

# 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 一、前言

2012年11月3-4日位於北京東廠胡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成立四十週年，舉辦了一場「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回顧與未來走向」高峰論壇。該會邀約近五十位海內外民國史研究的專家，進行了兩天「東廠論劍」的「神仙會」、「務虛會」，一方面祝賀該室「四十而不惑」，另一方面則就民國史研究交換一些想法。我是唯一的一位從臺灣去的參與者（另一位與臺灣學界關係較密切的是美國加州大學的葉文心教授），呂芳上館長希望我能介紹一下會中的討論。因為會場有二十多篇報告，含括了民國史研究的諸多方面，難以細述，在此僅就個人觀察所得，略做介紹，其中一定有許多誤會、疏漏之處，尚乞見諒。

## 二、民國冷熱

我的第一個感想是海峽兩岸對民國史研究之冷熱有明顯的不同。大陸近年來出現了「民國熱」與「民國範兒」（陳丹青挑起的話題，指民國人物之風範，是「一種趣味、一種風尚和一種美學」）的現象。這要從2006年蔣中正日記開放說起。民國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就表示：「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對外開放《蔣介石日記》，引發了新一輪的蔣介石研究熱潮，湧現出許多優秀成果，並進一步推動了整個社

會的『民國熱』，當然，這其間也不乏某些新聞炒作，『定義』出許多『記憶』中的『民國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很是熱鬧。」再者，2011年中國社科院36冊、二千餘萬字《中華民國史》的出版，顯示大陸學界長期以來的耕耘，使「大陸學界研究民國史的能量已在突飛猛進」。這些學術研究的成果與正式教育內容之間的落差，挑起了大陸老百姓強烈的好奇心，也引發了巨大的商機，促使更多大陸學者投入民國史研究。不過對於「民國範兒」的說法，大多數人都覺得是借古諷今，「追念的是未經革命『污染』的中國經驗」，有其現實意義，卻經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

相對來說，在臺灣社會之中民國史議題並不是一個能撼動人心的話題，在臺灣看不到「民國熱」，更少有人提到「民國範兒」。在媒體之中，現實的政經課題更能吸引人們的目光。然而臺灣與民國有血脈相連的關係，尤其是海峽兩岸許多現實爭議是歷史爭議，歷史爭議也是現實爭議。例如最近舞台劇「寶島一村」在大陸上演，引發議論，表演者因內容之「調整」而不滿：中華民國變成國民政府、國旗歌變成德國進行曲、西藏、新疆與達賴喇嘛等字眼不能提等，最後表演者憤而返臺。這一種文化交流也涉及雙方對民國史的詮釋。無論如何，民國史雖與臺灣的現實有千絲萬縷的連結，很可惜的是在臺灣民國史研究卻總是「熱」不起來，以呂芳上先生所主持的「《事略稿本》讀書

會」來說，定期參與者僅約三十餘人，這是臺灣最大的民國史研究的讀書會。蔣中正日記的開放在臺灣學界也造成一些衝擊，不過因閱覽不便、家屬授權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連馬總統出面都發揮不了作用），反而使我方喪盡先機。蔣日記開放培養出的史界明星幾乎全為大陸學者。這有點像是一副好牌在握，卻拱手讓人，頗令人扼腕。

### 三、臺灣民國史研究的特點與貢獻

不容諱言，臺灣學界對民國史研究也有很多重要的貢獻，在許多方面可以與全世界其他史學傳統對話。首先是史料的整理與開放。近年來我們積極地徵集、整理出版各種史料，如國史館出版的《事略稿本》、《五記》等；中研院近史所整理中與已出版的史料包括王世杰、譚延闓、陳克文、傅秉常、包天笑、傅正等日記；胡適與經濟部、外交部檔案等。在史料豐富性與開放程度上我們遠遠超過大陸同行（大陸史料出版仍有因政治目的而逕行刪節的例子，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適全集》即是如此）。尤其是透過史料數位化，許多臺灣地區的史料可以在網路上讀取、列印，便利學者使用。這一方面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另一方面我們也堅信史料乃天下之公器，只要不涉及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應儘可能地公開，並尊重其原始之面貌。

在民國史研究上我們也力求依賴史料，追求學者間的共識。兩岸學界均追求客觀的歷史研究，雖因主觀立場之差別而仍有歧異，然近年來在臺灣民主化、大陸改革開放的情勢之下，兩岸共識增加了許多，不再是黑白對立而沒有交集。例如抗戰正面戰場是誰打的、蔣介石的是非功過等，都較以往有更多的共識。大陸學界大多數學者均已肯定蔣中正先生所領導的國軍在抗日正面戰場上的重大貢獻，同時，對他的評價也從以往的「蔣匪」轉變為較為正面的形象。簡言之，兩岸的研究可以產生互補的效果。以蔣介石與國共內戰的研究來說，臺灣學者多能呈現蔣與國民黨的長處、成就；大陸學者則易於看到其缺點與限制。雙方同意以史料為基礎從事解釋，而非以既定立場來討論問題。臺灣學者也希望能從歷史問題的和解走向現實的和解，共同思索兩岸的未來。

但是另一方面兩岸仍有不少的分歧。大陸學界以為民國史斷限在 1949 年；臺灣學界則強調民國仍然健在，民國史研究要跨越 1949 年。這是近年來兩岸學術界企圖合寫民國史，卻總談不攏之癥結。這涉及雙方對「正統」問題的看法。針對此一情境，臺灣發展出 Y 字型的民國史觀。此一觀點將當前中華民國的歷史看成是由 1949 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史與日本統治臺灣之匯合。這樣一來臺灣學界強調民國史研究需跨越 1949 年，其長處是看到歷史的沿續性發展，並肯定中華民國仍然存在之事實。

為體現此一理念，近年來臺灣學界主要以蔣介石、胡適研究為中心，來深化民國史研究，同時關注：五十、六十年代的研究，冷戰與海峽兩岸研究等。例如，近年來本人連續推動蔣介石與 1950-1970 年代臺灣之集體研究計畫。同時，我們也希望採取東亞乃至全球的視角，例如研究全球視野下的抗戰、書寫多面向的中日關係史、重寫中日戰爭史、冷戰對東亞各地的影響等。

臺灣學界的另外一特點是關注主流論述之外的寬廣世界。這與民主化、後現代主義對主流話語霸權之反思密切相關。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曾談到「被壓抑的現代性」。五四之後，現代性話語一枝獨秀，同時帶來許多爭議與壓抑。臺灣學者對此反省，因而提出對啟蒙論述（啟蒙理性）的質疑、對現代國家的質疑（傳統的政治史即深受國族意識所壟斷）等。歷史研究之視野也拓展到民主、科學、現代化等議題之外，例如有關倫理、宗教與終極關懷的研究，並擴大到非理性論述或另類論述之研究。再者，近年來對近代中國知識史與文化史的研究蓬勃發展，這一方面有知識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背景，也有認識論上、文化批判上的原因。這些研究包括：清遺民、政治運動之受害者、邊疆研究、各地獨立運動、新興宗教團體、都市文化、小報、女性史、下層社會等，企望能從「邊緣」回觀中央、批判中央。此外，為因應新課題的發展，也開拓新史料與新視角，其中視覺史料（包括照片、地圖、

電影等)與空間研究(這方面臺灣的城市研究與歐美學界有密切的合作,此次會議中葉文心教授的報告即是「空間思維與民國史研究」)頗為熱門。這些議題與處理手法也是大陸學界較為少見的。

#### 四、走出革命：大陸民國史研究的走向

近年來大陸史學界逐漸走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框架,多數學者不再根據「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來從事歷史論述。此一轉變帶來各方面的變化,首先是回歸史料、「從材料出發」,來「發明」時代(這是中山大學桑兵教授的觀點),並要求大陸史料管理單位的開放與史料整理與應用的國際化。會議中邀約了南京第二檔案館的曹必宏副館長與會,就二檔館在史料整理、數位化與開放問題,作了報告。討論時砲聲隆隆,一致要求二檔館能更順應學界之需求,開放館藏。另一位史料典藏單位的與會者是中國政協文史館的許水濤先生。此一文史資料館於今年9月正式揭幕,有十層大樓,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許先生表示中國政協文史館肩負徵集、收藏、研究、展示、利用文史資料的職責,館內藏有數億字的文史資料手稿、圖書以及大量的照片、字畫、音像等。「這些親歷、親見、親聞的史料從各個角度再現了百年以來的歷史風雲,揭示出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和歷史細節」。另外他們

也嘗試推動口述史。該館之館藏對民國史研究乃一寶藏,值得挖掘。第三位討論史料整理的學者是復旦大學的吳景平教授。他以「加強海外藏民國人物個人檔案的整理與研究」為題提出報告。他集中介紹蔣介石、孔祥熙、陳光甫、顧維鈞、與宋子文檔案;並與他與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合作案,分享國際合作共同整理與出版檔案之經驗。南京大學的陳謙平教授也指出,史料應用的國際化,對外交史的研究尤其重要。

回歸史料、從檔案著手的歷史研究也帶來「告別革命」之後的「細碎化」的問題,這方面最近幾期社科院近史所編輯的《近代史研究》有不少的討論。大致而言,在走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之後,如何一方面從事實事求是的微觀研究,同時能注意大的歷史視野與歷史的延續與斷裂,是大陸學界目前所面臨的重要課題。針對此一挑戰,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以「革命視野下的民國史與民國史視野下的革命」做出反省。他提出「淡化民國史、強化近代史」的口號,並掙脫以「革命」、「反革命」作為研究的框架,尤應放棄以民國史為「反革命」之歷史;從描寫與分析之角度關注民國史與清史和共和國史之間的連續性問題。北京大學的羅志田教授也同意此一觀點,要從「更長的時段觀察思考」,民國史既有繼往也有開來,如此才能理解「五千年之大變究竟何在」。

在走出革命之後的民國史研究,有幾個較重要的思考方向。第一是人民大學楊念

群教授所提出來的，重新思索清朝與民國之關係。以往幾乎都從斷裂的角度來看中華民國的成立，從制度到思想、生活，都視為一個嶄新的時代。此一視角忽略了連續性的面向。因此他提出「從『正統性』與『合法性』相互糾纏互動的角度重新審視清末民初變革的成敗得失」。同時，民國政權建設的成敗「取決於其是否真正繼承而非絕然斷裂的眼光審視清朝遺留下來的傳統資源」。

第二、許多學者都指出「北洋時期」研究的重要性。四川大學的楊天宏教授指出北洋政治史在「國共夾攻」之下，退縮到歷史的邊緣。上海華東師大的茅海建教授則指出北洋制度史研究頗為缺乏。事實上，北洋在制度與人才上均與國民政府關係非常密切，這在外交體系方面尤其如此。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在唐啟華教授與一些臺灣、海外的學者的努力下已有一些成果，然而仍待開發。

第三、人民大學的黃興濤教授與南京大學的孫江教授提出以「概念史」、「社會史」作為切入民國史的視角，來關注關鍵概念演變，及詞語的政治與社會內涵。這方面理論性的思考，受到德國概念史研究傳統的影響，可參閱孫江的〈概念、概念史與中國語境〉一文（《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南京大學也在近期內由孫江主編一個概念史研究的專業期刊。

第四、關注1949年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1949年之前的連續性。楊奎松教授以農村、土地制度與土改引發的自殺現象

等問題的研究指出，許多農村的現象不是從1949年開始的，這方面各地情況很不相同，必須追溯到民國時期各地的宗族組織、土地制度、在地與不在地之大小地主與佃農之關係等。此一課題之探討需用到地方層級的檔案，但如何解讀則涉及檔案製作過程之反省與內容之辨析。此一議題引發激烈的辯論。最後楊奎松指出面對土改所引發的自殺問題，應對革命作一反省，從宏觀角度思索革命所付出的代價與革命的意義之所在。

## 五、結語

歷史學家長久以來即追求一個高貴的夢想，即是客觀性的追求。然而從懷疑主義到後現代都對「客觀」有所挑戰。這也涉及歷史與現實的複雜關係，「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永恆對話」。民國史研究尤其與現實之間有多重糾葛，不易超脫。無論如何，在史料基礎之上來從事詮釋與意義編織的「歷史工作」是一個需要不斷反省的過程。這需要對本身工作的自信、自疑與自覺。這一次民國史的高峰論壇既有回顧、亦有展望，並提出具體的實現手段，對於未來學界民國史研究應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